

元代云南教育考

王风雷¹，张敏杰²

(1、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2、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1253年，忽必烈奉蒙哥合汗之命，帅师进入云南，便拉开了蒙古人开发云南的序幕。也正是蒙古人的这一历史活动本身，为当地土著居民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文化，在客观上推动了其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云南的开发不只是蒙古人有贡献，其他民族也做出了贡献。这里最为典型的人物，首先是张立道，其次才是赛典赤赡思丁。蒙古人在云南创办的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首先是蒙古字学；其次是科举考试；第三是医学和阴阳学；第四是农业技术教育；第五为儒学。结论是，蒙古人开发云南教育的措施得力，功绩卓著，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关键词：元代；云南；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G527

文献标识码：A

综观元史研究，蒙古人对云南的开发，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且在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253年，忽必烈奉蒙哥合汗之命，帅师进入云南，便拉开了蒙古人开发云南的序幕。也正是蒙古人的这一历史活动本身，为当地土著居民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文化，在客观上推动了其社会发展的进程。

据史料记载，蒙古统治者进入了云南之后，他们一方面加强了对土著居民的武力征服，另一方面对被征服者实施了教育教化，因而他们在当地创办了各种形式的教育，为云南教育的发展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据史料记载，蒙古人在云南创办的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

首先是与蒙古人相关的蒙古文化教育。应该肯定的是，在忽必烈所率的十万大军当中有相当数量的蒙古军，他们的用语主要是蒙古语。忽必烈进军云南时，蒙古人所用的文字是通过塔塔统阿借用的畏吾体蒙文，而不是八思巴字。由于政治原因，当时在一定的群体内，畏吾体蒙文已成为一个通用的文字，最高统帅们的政令或军令都要用畏吾体蒙文书写。为了保证政令和军令的畅通，在基层必须有懂得畏吾体蒙文的人，否则就会误事。所以在蒙古军、回回军以及汉军当中都有一定名额的精通畏吾体蒙文的必闾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精通畏吾体蒙文的必闾赤们一方面肩负着向蒙古军、回回军和汉军传授蒙文蒙语的任务，另一方面把草原文化，即蒙古族文化带到了云南边地，为那里的文化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蒙古人进入云南的时间上看，1253年至1269年的16年时间里，蒙古人在云南用的语言文字基本上都是畏吾体蒙文。所以笔者以为，在战争期间，精通畏吾体蒙文的必闾赤或蒙古将领们很可能向云南土著居民传授过蒙文蒙语；另外，从战争的需要出发，为了获取对方的作战意图或相关的军事情报，大理国的守军也很可能有意识地学习过畏吾体蒙文。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这一问题无法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蒙古人在云南没有采取强制的手段推广蒙文蒙语，相反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宽松而温和的政策，充分保护

了云南的土著文化，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另据文字记载，畏吾体蒙文在云南地区通行的时间更长一些，到了1340年的时候，当地的蒙古统治者仍然运用着这种文字。为此，在昆明市西玉案山上的筇竹寺内所藏的《云南王藏经碑》[1]，就能够说明这一问题。该碑用畏吾体蒙文较详细地记录了云南王阿鲁向筇竹寺下达的指令，正是这一碑文为我们留下了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文字材料。总之，在整个元代，进入云南的蒙古人以其特殊的方式向后人传承着畏吾体蒙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到了至元六年（1269年）的时候，随着蒙古新字的颁行，蒙古统治者为了全面推广这一文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诸路蒙古字学。应该说，这一诏令在云南边地也不例外，它要求在其所辖地区必须建立相应的蒙古字学，以培养统治者所需的人才。全国一盘棋，云南诸路蒙古字学的产生、发展与元朝政府所制定的文化教育政策是一致的。

元代云南诸路蒙古字学的资料不多，而且也比较零乱，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元代的蒙古字学与帝师八思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元代云南的诸路蒙古字学也不例外。在某种程度上帝师殿成了蒙古字学的代名词。据史料记载，延祐七年（1320年）十一月，元朝政府“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2]，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蒙古字学应有的地位。毫无疑问，蒙古皇帝的这一圣旨在云南地区绝对不会打折，它将会原原本本地得到落实，这也是政令畅通的一个重要标志。泰定元年（1324年）八月，政府命艺术家“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俾塑祀之”[3]。这十一个行省里就包括了云南行省，所以元代云南行省所辖的诸路蒙古字学，基本上都按统一绘制的八思巴像进行塑祀这一名人。据史料记载，云南的帝师碑在河阳县（今云南澂江县东）东阳浦山[4]。这仅仅是一个前人的记载而已，石碑的下落还不太明确。经研究我们发现，元朝政府于延祐六年（1319年）十二月，省云南大理、大、小徼里（也叫车里，大约在云南景洪附近）等地同知、相副官及儒学、蒙古教授等官百二十四员[5]。元朝政府为何要裁减包括蒙古学教授在内的官员，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由此可见，元代云南地区蒙古字学的发展并不乐观，可谓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与元朝政府实施的总的科举考试政策相适应，云南地区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科举考试。蒙古统治者通过在云南等边缘省份实施科举考试，既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同时又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按当时科举考试的规定，云南的科举考试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在同一个时间进行。“乡试，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明经疑二问，经义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6]。应该指出的是，在云南的乡试中有汉人的考试，而没有南人的考试。元代南人的乡试只局限于湖广、江浙、江西、河南的部分地区，其他地区则没有。另外，元代云南的蒙古、色目人与全国各地的蒙古、色目人一样，要比汉人、南人少考一场。

从当时科举考试名额的分配情况看，元朝政府对乡试一级的考试后，各地应录取的名额限制的特别具体，决不允许随意扩大名额。据史料记载，当时政府通过乡试从云南取一名蒙古人、两名色目人、两名汉人[6]，南人则零。乡试录取名额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色目、汉人的人口比例，当时入滇的色目人很可能多于蒙古人和汉人。这一判断是否能站住脚，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云南的土著居民未能参加科举考试，这说明元代的选士制度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许是元代科举考试的一大盲点。然而，我们绝对不能用现代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750年前的人和事。众所周知，蒙古人在云南土著居民当中创下的土司制度更符合其民情，因而在当时条件下，对他们实施科举取士，似乎有点脱离实际。总之，从汉、唐以来中央政府能够在云南边地开科取士，元朝已经首创了历史记录，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元代中原地区的乡试资料很多，但是有关元代云南地区乡试的资料并不多见。因而研究元代云南的乡试有一定的难度。具体到他的命题、考试、监考、读卷、评卷、发榜、以及考生的报名、审核、组织、管理等诸多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不管怎么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元代云南的科举考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表现在进士登第方面，云南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改写了历史记录。其代表人物是：昆明人王楫于至治元年（1321年）登进士第[7]；昆明人李近仁于至顺元年（1330年）等进士第[7]，在有些资料里，把李近仁写为

李敬仁[8]；昆明人李郁于至正八年（1348年）等进士第[7]；昆明人段天祥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等进士第[7]；昆明人李天佑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等进士第[7]。可见，元代云南进士中，昆明人居多，这与昆明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

据《云南通志》载，云南也有外来的进士。其中郃阳（今陕西合阳）人支渭兴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于文宗至顺庚午（1330年）登进士第，后为云南考试官，道梗，屡进宣慰、副都元帅，有惠政，能文章，所著诗集行于世。又据《云南通志》载，四川什邡（今四川什邡）人冯文举初举乡试，次登进士第，任云南儒学提举，后与明玉珍战死，以其血肉之躯为元王朝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可见，元代从外地来云南做官的进士，为边地的开发，甚至为这一地区的安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此，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

从理论上讲，与元朝政府所实施的文教政策相对应，云南地区也应该有医学教育。因为医学与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必须有传承医学知识的专门场所，这是一个情理中的事情。笔者以为，蒙元时期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医药学知识向云南地区渗透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那些进入云南的文臣武士们，或多或少把内地先进的医药学知识技能带到了边缘落后地区，并在实践中向当地老百姓加以传播，扩大了中医的影响。众所周知，元朝政府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对医务人员进行的考试也是非常严格。其结果，大量地淘汰了混饭吃的庸医，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水平，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些政策措施，理应在云南地区得到落实。此外，蒙古人的传统的蒙医学知识，如蒙古人的正骨及治疗战争创伤技术，也应在云南地区得到传播。云南土著居民所特有的医疗技术，也应予以特殊的方式得到传承。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这些问题无法进行深入探讨。

和全国各地一样，元代云南地区也应该有阴阳学。当时元朝政府主要通过阴阳学教授，向弟子们传授天文、历法、算学、地学、周易等知识，培养了一批应用型的科技人才。因此，阴阳学是属于科学教育的范畴。元朝政府在创办阴阳学的同时，为该学编写了名目繁多教材，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另外，元朝政府在选拔阴阳学人才方面，也实施了严格的考试制度，进而保证了人才的质量。蒙古统治者一方面积极利用阴阳学人才，另一方面想方设法限制阴阳人的言论自由，维护了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后人留下了成功的执政经验。遗憾的是，这些史实在云南的方志当中并不多见，因而讨论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蒙古人进入云南以后，把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边缘落后地区，为当地的老百姓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实现了先进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民以食为天，元朝政府在大力开发云南农业的同时，对当地土著居民进行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技能的传播，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史料记载，蒙古统治者在云南没有设立专门的农业技术学校，相反，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主要通过生产过程进行的。在云南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张立道还是有贡献的。据《元史·张立道传》载，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张立道“领大司农事，中书以立道熟于云南，奏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鸡（位于昆明西南三十里）、金马（位于昆明东二十五里）之间，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泻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爨、僰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赛典赤在云南也实施过“教民播种”计划，收到了较好的成效。据《元史·世祖十》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云南行省臣脱帖木儿言蠲逋赋、徵侵隐、戍叛民、明黜陟、罢转运、给亲王、赋豪户、除重税、决盗贼、增驿马、取质子、定俸禄、教农桑、优学者、恤死事、捕逃亡十余事，命中书省议其可行者行之”。这样，元朝政府把“教农桑”作为一个急务来处理，其效益是不难想象的。总之，游牧民族进入云南以后，为开发当地的农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说实在的，对云南的开发不只是蒙古人有贡献，其他民族也有贡献。这里最为典型的人物，首先是汉人张立道，其次才是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当然，后者的政绩和知名度要高于前者，这是无

可非议的。但从两人入滇的时间顺序上讲，张立道在至元四年（1267年）以皇子忽哥赤—云南王的王府文学的身份[9]在云南上任，而赛典赤赡思丁是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10]，前者比后者早七年。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必须予以正视。

要说元代云南的学校教育，其儒学还是很有名气的。蒙古人进入云南以后，他们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影响下，在全省各地创办了许多儒学，并且通过儒学向当地的土著居民传播了古老的中原文化，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赛典赤在云南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终于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认识到了“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婚配，亲死者火之，不为丧祭。无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的现实。为此他的对策是，向土著居民“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种，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庙，明伦堂，讲经史，授学田”，其结果是“文风稍兴”[10]，真正实践了“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11]的理论。应该指出的是，对赛典赤在云南办教育的问题，《元史》的记载比较模糊，只在宏观上进行了描述，具体在什么地方建学，都不清楚。然而，在有关云南方志当中，对此做了较详细的记载。赛典赤出资建造的庙学（不取于民）在中庆（今云南昆明市）北偏；该学为屋五十有三楹，里面有夫子像，宛邠沂邹四公与夫子哲配焉，两庑翼其旁，七十之徒及历代名儒有功于世教者，绘其像而列焉，内外有门，左右有堂，双亭对峙，跋翼翬飞，别建讲堂以为师儒授受之所；儒学始于至元甲戌（1274年）之冬，落成于丙子（1276年）之春，是岁八月开学；以后的学务由脱脱木儿继管，王荣午充教官。[12]由此可见，赛典赤是元代云南教育的开发者和奠基者，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为云南教育、蒙古族教育，乃至中国教育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笔者以为，赛典赤的办学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元朝政府治理云南的一个政策导向或执政方针，为当地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当时条件下，在治理蛮荒地区时，能够出台这么好的政策，并予以落实，确实不容易，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正是这些感人的事迹，为赛典赤赡思丁的形象增添了不少荣辉，使他成为一个不朽的历史人物。

据史料记载，继赛典赤赡思丁之后，张立道为云南的教育作了一些具体的事情。他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除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9]张立道的兴学义举应该与其官衔吻合，因此他很可能就在中庆路，在赛典赤赡思丁的基础上拓展的。但是，《元史》对张立道的记载，特别是“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的记载与史实不符。对于这一点，龙云监修，周钟岳编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十二《金石考十二》中，给予了订正。此外，已故的方国瑜先生早在1958年在《云南大学学报》撰文，对此也给予了订正；最近著名的历史学家方龄贵先生也撰文，进一步肯定了方国瑜先生的论点。[13]所以我们对《元史》的引用也应慎重，以避免错漏。根据这一线索，我们怀疑张立道在中庆路办学的历史事实，那恐怕是错误的。他创办的路学，很可能是在赛典赤的授意下进行的。张立道和赛典赤办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另外，在云南方志当中，在谈到中庆路学时提到了一个叫张侯[14]的人，但没有其他信息。笔者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张立道呢？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对他进行深入考证。事实证明，张立道是一个热心于办学的人。他在云南任职期间，不仅创办了中庆路学，而且也创办了建水路（今云南建水）庙学。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张立道“迁临安（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广西道军民宣抚使。复创庙学于建水路，书清白之训于公廨，以警贪墨，风化大行”；正因为如此，史书上评价他说：“张立道官云南最久，颇得土人之心，为之立祠于鄯善（今云南省昆明市）城西”[9]，这恐怕是人们对他的最高褒奖。

除了赛典赤和张立道，郝天挺对云南的教育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据《元史》记载，建省云南，选官属，郝天挺除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寻升参知政事，而且他也修过《云南实录》。可惜的是，有关他对云南教育所办的实事，《元史》没有提到。值得庆幸的是，一些被保留下来的金石录，给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弥补了正史之不足。至元乙酉（1285年）春，在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郝天挺的倡议下，大理路军民总管段信苴、承事郎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赵世延等人齐心协力共同

创办了大理路儒学，并由赵傅弼充任了教官之职。^[15]对此，记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的大理五华楼元碑中，有相近的记载，只是多了嘉议大夫签省张汝贤和承务郎员外焦征等^[16]二人。根据方龄贵先生的研究，该碑的行文与郭松年撰的《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有很多近似之处。^[17]大理是云南土著居民的聚居地，蒙元统治者能够在此建学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空界限，成了中华民族，甚至成为全人类的一大文化遗产。

郝天挺的兴学业绩还表现在，他首先拿出自己的俸钱与其同僚们共同集资；在此基础上“宣抚同知赵好礼檄使是邦，力襄厥事，亦倾行篋以资其不足，宪签张贞、员外贾天佑与焉。卜庙地于路治东”，进一步落实了大理路文庙的具体工程，促使“三门耳墙毕于丁亥（1287 年）之闰”。^[18]对于这一点，赵傅弼在大理路文庙碑的碑文中，以满腔的热情讴歌了地方官员兴学的义举，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据史料记载，大约在至元丁亥（1287 年）以后，大理路庙学“增建东西弟子两庑，延祐庚申岁（1320 年）孟春之初，……日告庙，既竣事，顾瞻庙貌已完”^[19]，这说明，大理路庙学呈现了发展的态势。另外，在大理路儒学中，也有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立的《大理路孔庙圣旨碑》，其碑文由云南诸路行尚书省令史韩口、承务郎同口茫部路（今云南镇雄县西南）总管府事王如珪书丹、奉政大夫云南诸路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也舍奴题额^[20]，其碑文与《通制条格·学令·庙学》中的第三条一致^[21]。蒙古元统治者颁行的这一圣旨，对云南教育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为了更好地发展云南的教育，元朝政府对师儒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考虑。为此，他们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四月，作出了“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22]的规定，很好地解决了云南各地教官短缺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一规定还是比较符合云南实际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四川是云南的近邻；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云南要落后于四川。所以四川输出教官支援云南的作法，还是比较可行的。

元代云南的地方官员们不仅在创建儒学方面有业绩，而且在修缮破旧的或被损毁的儒学方面也是有业绩的。据载，到大德元年（1297 年）的时候，中庆路学的殿堂因“岁久颓腐”，都成了危房，对此，政府拿出紧急措施，派员修缮了学舍，使儒学焕发了青春^[23]。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三月，中庆路庙学遭贼兵袭击，经籍礼乐之器损失过半；面对这一事实，蜀国公银青荣禄大夫本省右平章知枢院使脱欢普化，捐己俸以倡在位者各出俸金，梁王亦赐白金以助，于是买材募匠命郎中危毓董其役；结果是“栋楹椽瓦腐裂者易新之，赤白漫漶坠落者补治之。自大成殿宸章阁两庑三门、讲堂斋舍以及献官更衣之所、提举教授治事之厅，下至仓廩庖厨、百而器用莫不毕具。补礼乐器之缺，购经子史之亡，悉如其故”，此外，学田的租入问题也得到了解决^[24]。可见，到了元末，云南的兴学热潮仍然方兴未艾，形成了强劲的气势。

据史料记载，延祐五年（1318 年）二月初四，当地官员可能在中庆，今昆明孔庙立了加封孔子碑；该碑分上下两截，上截十一行刻圣旨，下截二十三行刻题记，而且署有官员姓名。^[25]该碑与元净州路儒学碑（今在成吉思汗陵）相比，有一定的差异。元净州路儒学碑的正面刻有加封孔子制，背面记录了儒学的基本情况。^[26]按元制各地儒学都立有加封孔子碑，但具体到一个儒学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元朝政府为了发展云南的教育，在当地设立了儒学提举司^[27]，把教育纳入了正常的管理。元朝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措施，在今天看来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元代云南中庆路学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当时包括爨樊子弟在内，共有一百五十名生徒^[28]。那个时候能够聚集这么多的生员，已经很不容易了。天历年间（1328—1330 年），中庆路儒学除了具有一定的典籍和礼器之外，还有一些“钟鼓笙镛”^[29]。由此可见，中庆路儒学和内地的儒学一样，对生徒们进行了音乐教育，并通过这一形式，保留了大量的音乐文化。起初，中庆路学有八双（一双为四亩）学田，后置学田五百九十二双，至正十六年（1356 年）间，没官田二百一十九双三角，增租一百三十八石六斗^[30]。可见，在各级官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庆路儒学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利益的驱使使一些豪民侵占了学田，经学官们的努力与诤讼，最终解决了学田的归属问题，并且租入问题得到了落实。这一点，在《元史》忽辛传中，有一定的记载^[10]。

为了防止学田被豪民侵夺，教官们用法律的手段为学田制作地契，一份交给官府，一份留给路学，另一份刻在石碑上“以备他日取证”[31]，保护了庙学的田产。

在发展云南教育方面，个别蒙古官员的业绩也是非常突出的。泰定乙丑（1325年）人们在元帅府（今通海县境内的曲驼关）创建的儒学[3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阿喇帖木蒙古右旗以都元帅府的名誉在曲驼关修建的文庙[33]的史实，都很能说明问题。

另外，蒙元时期，濞江、邓川（今大理北）、永昌府、鹤庆府（今鹤庆市）等地都建立过庙学[34]。云南所有的儒学以及其他类型的教育一直延续到明初，成为明代教育的铺垫。

总之，元代云南的教育是丰富多采的，研究它有助于全面把握整个元代的教育，同时也有助于理清蒙古族教育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参考文献

- [1]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巴·巴根校.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M]. 蒙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307—318.
- [2]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二十七：《英宗一》. 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
- [3] 元史[M]. 卷二十九：《泰定帝一》. 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
- [4] 沈云龙主编. 中国边疆丛书[M]. 第二集. 王文韶修. 续云南通志稿[Z]. 卷一百七十二：《艺文志·金石》. 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 龙云监修，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M]. 卷九十五：《金石考十五·后期四·元·待访》，民国三十七年铅印.
- [5] 元史[M]. 卷二十六：《仁宗三》. 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
- [6] 元史[M]. 卷八十一：《选举一》. 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
- [7] （清）鄂尔泰等监修，靖道谟等编修. 云南通志[Z]. 卷二十上：《选举》，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8] 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M].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民国71年. 545.
- [9] 元史[M]. 卷一百六十七：《张立道》. 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
- [10] 元史[M]. 卷一百二十五：《赛典赤赡思丁》. 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
- [11] 顾树森. 学记今译[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 [12] 龙云监修，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Z]. 卷九十二：《金石考十二·后期一·元·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郭松年撰文》.
- [13] 方龄贵，王云选录，方龄贵考释. 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151—162.
- [14] 龙云监修，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Z]. 卷九十三：《金石考十三·后期二·元·中庆路学讲堂记，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李源道撰》.
- [15] 龙云监修，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Z]. 卷九十二：《创建大理路儒学碑记，大理路儒学教授赵傅弼撰》.
- [16] 方龄贵，王云选录，方龄贵考释. 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12.
- [17] 方龄贵，王云选录，方龄贵考释. 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14.
- [18] 龙云监修，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Z]. 卷九十二：《创建大理路文庙碑，大理路儒学教授赵傅弼撰》.
- [19] 方龄贵，王云选录，方龄贵考释. 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29.

- [20]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二: 《大理路孔庙圣旨碑》.
- [21] 方龄贵校注. 通制条格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10—211.
- [22] 元史 [M]. 卷十七: 《世祖十四》. 北京: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6.
- [23]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二: 《中庆路重修泮宫记, 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王彦撰》.
- [24]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四: 《金石考十四·后期三·元·重修中庆路庙学记, 临安元江车里等处宣慰司副督元帅支渭兴撰》.
- [25]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三: 《皇元加号大成碑》.
- [26] 王风雷. 元代漠南地区教育考 [J]. 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社版), 2002, (2).
- [27] 元史 [Z]. 卷二十五: 《仁宗二》. 北京: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6.
- [28]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三: 《金石考十三·后期二·元·中庆路学讲堂记, 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李源道撰》.
- [29]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四: 《金石考十四·后期三·元·中庆路学礼乐记, 云南诸路儒学提举何弘佐撰》.
- [30]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四: 《中庆路增置学田记, 中庆路总管支渭兴撰》.
- [31]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四: 《金石考十四·后期三·元·中庆路增置学田记, 中庆路总管支渭兴撰》.
- [32]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五: 《金石考十五·后期四·元·待访·曲驼关元帅府碑》.
- [33] 龙云监修, 周钟岳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 [Z]. 卷九十四: 《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 云南诸路行中书省郎中李泰撰》.
- [34] (清) 鄂尔泰等监修, 靖道谟等编修. 云南通志 [Z]. 卷七: 《学校》.

A Study of the Education of Yunnan in the Yuan Dynasty

WANG Feng-lei¹, ZHANG Min-jie²

(1. Department of Pedagogy,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2; 2.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2)

Abstract: Qubilai got to Yunnan with his troops by order of Mongke, which started on the Mongolian exploitation of Yunnan. It was the Mongolian historical movement that took the advanced science and culture to the aborigines and objectively propelled the society forward. The exploitation of Yunnan could not be owed to the Mongolian only,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also made the contribution to it. Here were two representatives with Zhang Lida being the first to mention and Saiyid Ajall Shams al-Din the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Mongolian set up the education in Yunnan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forms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lexicology, Confucian studies,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instruction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ey words: the Yuan Dynasty; Yunnan;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05-3-15;

基金项目: 内蒙古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元代蒙古地区教育研究》(nj02129);

作者简介:1、王风雷(1957-),男,蒙古族,内蒙古扎赉特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蒙古族教育史研究;2、张敏杰(1963-),女,汉族,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运动心理研究。